



思想实验室

#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案例文本

从1978年5月开始，在我们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 一、这场大讨论是拨乱反正的需要、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十年“文革”的结果是：政治上天下大乱，冤假错案遍城乡；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普遍贫穷。严峻的现实说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再也不能沿着老路向前走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的领导者却提出了“两个凡是”。很明显，这就是要一切照旧，不许说新话，不许创新，不许开辟新路。“两个凡是”带有总方针性质，成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两个凡是”还有很大的影响，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实践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

# 案例文本

##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此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5月13日，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文章强调“唯一标准”，排除了“文革”中盛行的语录标准、权力标准。文章虽没有点“两个凡是”，却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正如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所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广泛的赞扬和支持，却遭到坚持“两个凡是”者的无理指责和粗暴压制。

## 案例文本

### 三、讨论的展开和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尖锐批评了“照转照搬”（实即“两个凡是”）。这个讲话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有力的支持。

罗瑞卿同胡耀邦一起，指导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长文，系统批驳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错误观点。此文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在第二天全文转载，有力地推进了讨论的发展。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谈话，告诫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龙活虎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 案例文本

广大理论工作者采取开研讨会、撰写文章、讲演等方式，大力推进讨论的发展。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标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连续报道，影响巨大。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到1978年8月、9月、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 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决战和成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开20天，实际开了36天。会议参加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共200多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工作会议。

## 案例文本

7月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与会者突破了会议原定的以经济问题为主的议程，陈云同志带头，以实践为标准，提出并检验了“文革”中的一些重大案件和一些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是与会者议论的一个热点。许多同志阐述了坚持实践标准的重大意义，指名道姓地揭露和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

## 案例文本

### 五、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而有些人还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这两个会议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议论这些问题。党中央采纳叶剑英的提议，召开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同志集中起来，深入进行讨论，更好地分清是非。

由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开幕。与会者对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尖锐而又善意的批评帮助。他们都做了自我批评。

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志解放思想，以实践为标准，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与会者指出，“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左”的理论，“文革”造成了严重恶果，要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破除个人迷信，等等。在当时来说，这都是超前的思想认识，一些还没有摆脱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的人，对此议论纷纷，甚至加以指责。

历史已经证明，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

## 案例文本

### 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上的讨论一度放松了。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同志发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阻力主要还是“左”的思想、思想僵化。从1979年5月开始，四川、江西、安徽、广东等省都提出，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在邓小平等倡导和支持下，从1979年7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就在多数省、市、自治区逐步开展，到这年的秋冬，就在全国内、在广大基层单位，普遍开展起来了。通过补课，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使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观点深入人心，成为他们总结经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文革”，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这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资料来源：沈宝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 案例分析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延安确立了。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党的政策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度不能顺利进行，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本案例阐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背景、经过和结果。通过本案例向学生说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如何重新确立的。